

以笔为旗

舒晋瑜 著

与军旅作家对话



作家

以笔为旗

舒晋瑜
著

与军旅作家对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舒晋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063-9465-9

I. ①以… II. ①舒…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当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9925 号

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

作 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李宏伟

装帧设计：申晓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15 千

印 张：23.5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465-9

定 价：3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舒晋瑜

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现为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



目 录

白桦：

文学是我的生命 · 1

毕淑敏：

我精心搭建想象中的世界 · 13

邓友梅：

身外无累，心中无事 · 30

都梁：

我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 · 38

二月河：

我不是反腐专家，我是小说家 · 43

冯德英：

我的作品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 · 54

何建明：

军人性格和作风在我身上足够浓烈 · 61

金一南：

心胜则兴，心败则衰 · 72

峻青：

我还没真正写出自己想要的作品 · 80

黎汝清：

军装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 91

李心田：

作家应该把对世界的看法说出来 · 104

李瑛：

在大好年代，重新出发 · 110

柳建伟：

我一直关注战争与和平 · 123

马识途：

文学应该注意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136

马晓丽：

我希望不断地从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 · 149

彭荆风：

“驿路梨花”今何在？ · 162

裘山山：

军人和女人，是我的两种身份 · 172

王树增：

寂寞书斋是我的理想生活 · 181

王宗仁：

写青藏高原，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 201

魏巍：

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 · 214

项小米：

从地工祖父的秘密到洪水时代的爱情 · 218

谢冕：

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 228

徐光耀：

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得好 · 238

徐贵祥：

重返“徐怀中时代”·249

徐怀中：

《底色》是我戎马一生的手模足印·260

阎连科：

我的写作和我的倔犟·272

忆明珠：

在“随心所欲”中寻觅“不逾矩”·290

张正隆：

我大概不是好士兵，但我努力成为好作家·297

周大新：

我想写出让人感觉温暖和美的作品·304

周涛：

纵情傲物三十年·318

朱苏进：

我为什么 not 写小说·327

朱向前：

三十年下了三步棋·338

朱秀海：

无论小说还是编剧，贯穿我对中国社会的思考·351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采访手记：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

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苦恋》和《吴王金戈越王剑》在上世纪80年代被禁演，以及后来所经历的种种运动，使白桦成为知识分子“苦难一代”的代表。

我问白桦：《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他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在特殊的时代，他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难。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后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士兵情结伴随他一生。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用木机梭织，织各

种各样的毛巾。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十五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很多士兵是为了小米饭才参军。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中有的人手还在动……淮海战役中，战壕都被士兵的尸体垫平。“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白桦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

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上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最多，是因为它最接近历史的真实，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

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实。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了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

白桦就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话使白桦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桦为了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一直到1977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

他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

能如愿。

白桦觉得，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革”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里讲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纪录片，也不是他个人的专题片，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白桦自己生活的经历。“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批斗，曾经想过自杀。“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旁边，有一个莲花池，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我就想跑进苇荡中去，然后就在里边自杀，可是一一直被看得很紧。《苦恋》中的主人公在‘文革’时期，逃到芦苇荡去生活，就是源自我的那个想象，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人。”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白桦的请求。他告诉白桦：“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希望你们的电影能

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这对白桦来说，是无比遗憾的事情。

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白桦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形成反差。吴祖光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

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白桦理解，这是胡耀邦能够说和必须说的话。

9月25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陈荒煤事后对白桦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10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白桦拱手对他说：“冒犯，冒犯！”白桦说：“可以理解！”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白桦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等前来参加。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从50年代起，白桦不止一次地站在

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他总是在最后排。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那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和贺龙拍过一次合影照。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他。胡耀邦对白桦本人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作家才能体会。

被批判的过程中，白桦就收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一位蒙古族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读到这儿，白桦泪如泉涌，他觉得这些足够补偿他经历的所有苦难。他说，《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我认为，人们肯定会像我认识到‘文革’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那个伤害不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伤害。”

“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他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1984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

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白桦觉得，自己一生的遭遇，源自性格悲剧。他是敏感的人，容易冲动，一直到现在，也没完全改掉。

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白桦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为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巨

大思考和争议。

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历史明明还记载着在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卑劣，却常被人们忽略。勾践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越王勾践伐吴归，义士归来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见鸱鸢飞。”

三十三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八十九岁的蓝天野在等待了三十三年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有些人称为“最阴暗的作家”。他的人道主义却深深地打动了白桦。出国访问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老往“枪口”上撞？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悲剧。我是敏感的人，容易冲动，在中学的时候就搞学生运动，按当地百姓的话是‘不安分’。一直到现在，也没完全改掉。”

他说，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再也不会“削足适履”了！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白桦：“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白桦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他的底线是，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这一创作观点，同样体现在他后来的长诗中。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诗人屠岸读后给白桦发来长信。他说：“我深切地感